



崛起的征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共产党

峥嵘岁月

(下)

徐成芳/著

辽海出版社

崛起的征程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共产党

峥嵘岁月

(下)

徐成芳 著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一 开国创制	1
1 “另起炉灶”	1
2 “一边倒”	29
3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78
4 《共同纲领》	89
二 交友御敌	92
1 第一次建交高潮，嘹亮的序曲	92
2 毛泽东首访苏联	99
3 抗美援朝，独有英雄驱虎豹	113
4 台海危机，刚柔并济护统一	120

三 求同存异	127
1 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秩序树立标的	127
2 日内瓦会议，中国首次作为大国闪亮登场	136
3 万隆会议，周恩来以和解精神舌战群儒	148
四 睦邻政策	162
1 中国对边界问题的基本主张	162
2 中国同五国划定边界	167
3 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印还击战	179
4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190
五 中美会谈	194
1 挥别硝烟，不准握手	194
2 世界上最长的谈判	198
3 以打促谈	210
4 华沙往事	219
六 中苏反目	226
1 “弟兄”反目为哪般	226
2 毛泽东二访苏联	233
3 中苏大论战的是是非非	251
4 豪杰不曾怕熊黑	256
七 第三世界	268
1 一支重要的世界力量	268
2 第二次建交高潮	271
3 与亚非拉等弱者为伍的得与失	280
八 西欧，日本	291
1 西欧的魅力与症结	291
2 中法建交	295

3	中日关系的恩怨情仇与曲折发展	308
九	“文革”外交	316
1	林彪、康生等的极左言行	316
2	驻外大使的遭遇	320
3	“三砸一烧”事件	328
4	毛泽东定向把关	332
十	反两霸，侧重打击苏霸	334
1	“九大”刚闭幕四老帅受命开秘会	334
2	均势专家基辛格获准秘密访华	351
3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364
4	第三次建交高潮	378
5	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	383

五 中美会谈

1 挥别硝烟，不准握手

中美挥别朝鲜战争的硝烟，于1954年一起走进日内瓦万国宫，商谈解决朝鲜和平统一问题。不同的是，中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迈着坚定从容的步伐，风度翩翩、和解豁达地走向日内瓦这个国际大舞台的。而美国则是灰溜溜地、僵硬刻板地来到日内瓦，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整个一幅冷战面孔。

关于周恩来的开朗和解与杜勒斯的呕气，李越然作了有趣的回忆：“……杜勒斯绝不是那种大呼大骂歇斯底里式的狂人或捋胳膊卷袖子，像赫鲁晓夫那样用皮鞋敲联合国桌椅的粗鲁人。他沉默寡言，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中。我注意观察过，他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一散会便低着头往汽车里钻，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观众招呼或讲演。”

“他是个‘思考型’的人物，不善演说，发言讲话不流利，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紧板着面孔读他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表明观点态度，便登上他那辆大型福特车，命令司机回去。”

“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疯狂的地步。他亲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我跟随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走廊，在休息室，曾与杜勒斯几次走

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不失柔和，从容大度，杜勒斯不同。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根本没有过，周恩来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主动去与杜勒斯握手。每次相遇，杜勒斯苍白的脸便立刻板紧，在远处时还恶狠狠盯一眼，走近时，便目不斜视平视前方，好像面前是一片旷野荒漠。但是，他的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肯定浑身不自在，外人看来不免像小肚鸡肠的女人一样可笑又可怜。”

“杜勒斯是决定政策的幕后操纵者，加上身患癌症，会议开始一星期，他安排好一切便离开会场回国了。由他的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代理团长。”

“经验丰富的老资格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抓紧时机来看望周恩来，向他传递信息。”

“美国这位代理团长史密斯你了解吗？”

“不太了解”。

“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艾森豪威尔麾下的一名将军，这个人跟杜勒斯不同。史密斯来日内瓦之前我们接触过几次。他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有些不满。”

“是这样吗？”

“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明智不现实的，缺少长远观点。”

“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哟。”周恩来思索着点头说，“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 作的机会。^①”

关于周恩来如何做史密斯的工作，王炳南回忆道：“会议

^① 李越然著：《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1页。

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

“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

“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在酒吧间谈话是非正式的，可以随便聊。”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史密斯又一次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总之他又讲了一些好话。”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

“据说，杜勒斯离开前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不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总理的钦佩。”

王炳南也澄清了一种在国际上流传很广的说法，他回忆道：“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进入会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 CHINA，C 在前，美国 USA，U 排在后，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距离我们很远。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处，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到一起。会议中间有 15 分钟的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当时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因此无论从客观和主观都不存在总理主动去握手而遭到拒绝的可能。在一些美国人的回忆录中，甚至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里都写到此事，实际上是以讹传讹。”

“当然在敌对的情况下，并不是绝对不能握手。我想起以前曾为此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美国驻丹麦武官在一个军事俱乐部里喝酒，他主动走过来要和我们的武官握手，当场遭到拒绝，弄得主人很尴尬，美国人也下不了台。这件事汇报到外交部，是我亲自处理的。后来，经部领导研究请示了总理后规定，今后我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不要这样生硬，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①。”

^① 王炳南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23 页。

2 世界上最长的谈判

中美会谈历时 15 年，实际进行 136 次会谈。前 9 年是由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担任首席代表，共谈了 120 次；王国权大使从第 121 次继续谈判到 1967 年 3 月的 133 次，后被文革造反派揪回国内。雷阳代办从 1969 年到 1970 年谈了最后 3 次。15 年会谈的主要成果，一是坚守住了并最终使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二是要回了一个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了一个沟通和联系的渠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可以说，大使级会谈就是中美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联系得更多。如果没有大使级会谈，我们有些话确实还难于找到表达的场合。每一次重大的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观点，提出看法，使每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因此，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那么，中美会谈是怎么开始的呢？这要追溯到日内瓦会议。

中国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并没有料到会在这次会议上打开中美会谈的大门。由于当时美国统治集团坚持不承认中国，还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又由于侵略朝

鲜，中美关系极度恶化，美国的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并加强了菲律宾的驻军，干涉印支战争，因此直到日内瓦会议召开时，中美关系仍十分紧张，尖锐对立。中美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合国大会控诉美国，此外，别无来往。

日内瓦会议，会上是斗争的场合，通常是各国代表读自己的发言稿，发表官方的意见；会下则是互相沟通情况，促进了解，在某些问题上取得默契的渠道。许多内情往往是在酒吧间聊天时吐露出来的。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在会下广交朋友，表现得非常活跃。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对中美关系十分关注，他们都在观察这两个代表团如何相处，有无来往。那些新闻记者更是到处打听，探寻中美两个代表团之间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做文章。

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回答得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这种手巾卷在滚筒上，要擦时往下一扯，后来者也照办）。”

但是，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关押在中国。中国也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美国公众舆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这些在押人员的命运受到了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摆布，他们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美国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时的情况是，它既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愿同我们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因此想通过第三者来办理这件事。当时英国已和我们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它受托于美国，照管美国的在华利益。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便想通过参加会议的英国

驻北京代办汉弗莱·杜维廉来接手办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

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周总理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周总理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接触的渠道。周总理的决策是明智和果断的。于是，我们告诉英国代办，现在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开会，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两个代表团进行直接接触，没必要通过英国作为第三者插手。5月27日，我国代表团发言人采取主动，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而且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

美国一方面是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艾森豪威尔就说过：“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早日回到祖国来”；另一方面美国统治集团也有愿望和新中国政府接触，摸摸情况。被首先派出来会谈的A·约翰逊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杜勒斯尽管外表上激烈反共，内心却有兴趣探索同中国缓和紧张关系以及使在押人员获释的可能途径”；再一方面，当时美国的一些盟国认为，中、美双方如能接近一些，将会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在这样一种内外都希望中、美进行接触的气氛下，美国同意和我们直接会谈，当时称作中美两国代表会晤。

通过英国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初步商谈。总理请示中央后，指定王炳南为中方代表，宦乡、柯柏年等同志也参加；美方的代表是约翰逊，当时他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约翰逊曾经参加过朝鲜停战的板门店谈判。

关于两国侨民问题举行的初步商谈，共有四次。

现根据王炳南回忆，叙述如下。

“6月5日，我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是美方选择的。看来约翰逊是有意要把气氛搞得轻松些，他挑选了国联大厦里一间没有桌子，只有几套沙发的会客室，给人感觉是会客，而不是会谈。当我们到达会客室时，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主动迎上来和我们握手，我们还随便寒暄了几句。”

“会谈进行了半个小时，气氛比较轻松，双方没有用恶语互相攻击。由于初次会谈，大家都有些拘谨，但是看得出来，约翰逊是位老练的外交家，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反映也颇敏捷。他提出会议时双方不作速记记录，这样交谈可以更富有探讨性，避免到处乱钻的记者得到情况，也更少一些拘束。我们同意了，并确定6月10日举行第二次会谈。”

“第二次会谈地点由我们确定。我们也在国联大厦找了一间房间。和约翰逊的布置不同。我们在房间里摆了一张大长桌，我方坐一边，美方坐另一边。这比在沙发上谈，气氛显得严肃些。约翰逊提交了他认为是被中国政府拘留的美国侨民与军人的名单，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我答复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我说：‘在美国的美国侨民，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极少数美国人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的。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将在下次会谈中答复你们。关于美国政府扣留的中国留学生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中提出。’”

“第三次会谈是在6月15日。我首先答复了上次会谈中美

方提出的问题。我说，中国方面同意因犯罪而被扣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他们的家属也可以邮寄小包裹。中国政府是按他们所犯的罪来量刑的。判刑后，如罪犯表现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我们曾经这样做过。至于约翰逊先生上次会谈中交来的名单，一经中国代表团收到这些人员的材料，当与美国约期会谈。”

“我们这些话讲得心平气和，做法也通情达理。接着，我谈到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留学生，不准他们回国的问題。这时，我的态度严肃起来。我严正指出：中国现有五千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当他们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美国政府却通知他们不得离开，甚至威胁说，谁要违反这一命令，将被判处5 000美元以下罚款或五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理由是充足的，我的心情也不平静。当时，美国对外实行对中国的军事讹诈，经济封锁，政治攻击，对内推行反动的麦卡锡主义，迫害和排斥一切对华友好的美国人士，对许多组织和个人进行调查和非法审讯，煽动反对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摧残美国国内的民主和进步力量。我们在美国有一大批爱国的、有成就的留学生，包括早年就去美国留学的钱学森、赵忠尧等。在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们欢欣鼓舞，积极筹划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他们不但受到美国的扣留，而且还受到非法的监禁、逮捕和虐待，致使有些人根本不敢提出回国的申请。新中国是这些华夏子孙的母亲，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他们愿意回来，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他们。”

“我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留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至于居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

也同样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虽有些语塞，但他一再表示，扣留中国的学者完全是按美国的法律行事的。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确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我对此多次提出指责和批驳，我坚决地说，这条无理的规定应予废除。”

“6月21日，举行第四次会谈。我首先提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

美国的态度是很顽固的，它只想在会谈中得到它想得到的，只想做于它有利的事。因此，约翰逊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说，美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肯定中国侨民依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有完全自由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

“约翰逊又一次强调了‘美国的法律和规章’，说穿了，他们就是不肯放中国留学生回国。”

“后来，在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又接触了两次。我方由外交部科长浦山为代表，美方由美国国务院中国司政治事务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代表。”

“这两次接触，双方审核了各自提交的名单。浦山向美国提出6名已经获准出境的在华美侨的名单，同时要求美方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情况，并再次询问美方是否同意中国方面在上几次会谈中提出的请第三国使节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詹金斯用外交辞令对中国批准6名美侨出境表示感谢，但他没有进一步提供有关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情况，并再次拒绝了我方关于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

会谈期间，我方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我们通情达理地处理了一些问题，也通情达理地提出要求，表现出中国外交斗争既灵活又坚持原则的特点；而美方由于政策僵硬，而且固执一点不及其余，以致常常把自己推到了被动的地位。双方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在以后的大使级会谈中也一再表现出来。

正如前述，日内瓦会议上的会谈，只是今后 15 年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这个前奏一经开始，就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死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以便于更好地观察美国，与之斗争，并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这是中国外交斗争的艺术，倾注着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付出的心血。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由紧张趋向缓和。但是，美国政府却开始积极筹划同逃窜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搞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一是美国企图使其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二是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对抗和准备新的战争。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因此就变得格外突出和醒目。党中央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形势，认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 月 2 日，美蒋正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8 日，周总理再一次发表声明，深刻揭露这个条约的本质，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我们绝不承认。

1955 年 1 月，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为了打击美蒋的“防御条约”，我解放军于 18 日一举解放一江山岛；2 月 13 日又解放了大陈岛。艾森豪威尔对记者发表讲话，要求联合国“斡旋”，并提出在“必要时”要使用军队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同时美国又反对我国和苏联提出召开讨

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十国会议。周总理一再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这一时期我们反对美国支持蒋帮的态度和做法是坚定和强硬的，我们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1954年底我们又扣押了另外13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

面对这一切情况，美国不和我们接触是不行的，形势逼得它必须看到新中国已经站立起来的事实。1955年1月，在美国的指使下，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过印度，征得我国同意后以他个人名义访华，实际上想刺探我国将如何判处13名美国间谍案以及其他情况。周总理向他指出，联合国在我国代表权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同时指出，是美国跑到远东来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军队。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也为了争取一个对我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周总理发表了愿意通过中美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

这个不到一百字的声明，就像巨石投水，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也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还需要安抚国内舆论在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的指责，这样美国政府就不能对周总理的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于是，7月13日，美国政府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第一次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